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ISSN 1001-4403,CN 32-1033/C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行动—规则—空间”视角下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思考
作者: 段进军
DOI: 10.19563/j.cnki.sdzs.2024.03.002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5-15
引用格式: 段进军. “行动—规则—空间”视角下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思考[J/OL].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9563/j.cnki.sdzs.2024.03.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行动—规则—空间”视角下 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思考

段进军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人文经济学研究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这是因为它的基本“理性人”假设导致其理论体系越来越缺少人的概念。我们需要将“理性人”假设转变到“行动人”的假设,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去思考未来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的发展。首先,从“理性人”转到真实的“行动人”,赋予了人文经济学以主体概念;没有真实的行动主体,就难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也难以形成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其次,行动人有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建立与其他行动人之间的协调问题,而这种协调要通过一般性规则来实现,一般性规则又产生于大量微观个体之间的长期博弈,这赋予了人文经济学以规则内涵。最后,要赋予人文经济学以空间维度,这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必然逻辑和实践推演;不同空间的经济秩序和文化生态生成于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其一旦形成又会对空间中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之,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去思考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揭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内涵,推动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行动;规则;空间;人文经济学;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段进军,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东吴智库执行院长,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05;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4)03-0009-10

DOI:10.19563/j.cnki.sdzs.2024.03.002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苏州考察时说:“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①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人文经济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一年以来,人文经济学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虽然很多学者都从本学科对人文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学界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走向尚未形成共识。要科学认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深刻反思,特别要反思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导致其远离

①②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1版。

客观现实,理论体系越来越缺乏人性,没有人的自由意志概念了。因此,需要改变“理性人”假设,将“理性人”假设转变成真实“行动人”假设,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去反思西方经济学,深入思考人文经济学的内涵,并据此研究人文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需要从它的假设开始,即“理性人”假设。凭借“理性人”假设,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之中。物理学研究的是物的原理而经济学面对的是一群人,人与物的重要区别是人会思想,人是有手段和目的的,而物则不会思考,更不会有手段和目的。因此,将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经济学中,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主流经济学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经济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其中,目的在于把自己变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但实际上导致经济学离科学越来越远。其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很多情况下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导致其在思想上越来越贫乏。经济学在自己营造的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奥地利学派米塞斯曾说:“我们对自然科学相关事物的研究是从‘无’开始的。我们观察的结果是建立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然而,在人的行为科学中,从内心理解现象。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处在一个把握人的行为之含义的位置上,也就是包含在行为者自身行为之中的那个含义。”^①他还说:“我们还不知道外在的一些事实(物理的和生理的)如何在人心中产生一定的思想和意志,而终于有了具体的行为,我们就得面对这道无法超越的壁垒:方法论的二元论……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有两个个别领域:一是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理现象的外在世界;一是思想、感情、价值取向和有目的的行为的内在世界。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两个世界还没有桥梁联系起来。”^②米塞斯坚决反对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之中,他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理性人”假设是把人变成一个“原子”,这个原子没有任何思想,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经济学简化成为求最大化和最小化的数学问题。原子般的个体不会考虑和其他个体的关系,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中,原子般的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协调问题预设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个个体无所不知,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经济学所追求的完全竞争,其假设在不同厂商之间信息是完全沟通的,这和现实完全不相符,完全竞争市场模式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竞争对现实缺少一种解释力。可见,主流经济学没有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协调问题,它所研究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多人的世界,自然也就不存在着一种规则和制度去协调人们的关系。^③经济学虽然是社会科学但实际上是最不社会的。^④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理性人”不是真实的社会人。正是因为经济学考虑一个人的世界,这个原子人是没有情感和温度的机械人,是绝对理性的,但现实中没有绝对理性的人,企业家面临的环境中信息从来都不会是完全对称的,所有伟大成功的企业都是不断试错的结果,真实的人都存在着不理性 and 感性的一面。经济学最擅长于预测,但经济学从来不可能对复杂的世界进行正确的预测,因为现实包含的变量太多了,不可能像物理学一样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的预测。正是“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必然舍去空间的差异性,把差异的空间转变成一个同质的空间,仅仅把时间纳入其中,而且这个时间也是缺乏一种差异性和主体体验性的均质时间。主流经济学将现实差异的空间转变成一个同质的静态的空间,是其对现实缺少解释力的重要原因。空间是差异的,是与社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空间的舍去就等于将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从

①②伊斯雷尔·M.柯兹纳:《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朱海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③朱海就:《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12-113页。

④金碚:《新盛时代,本真复兴——金碚新论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第328-32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去。

“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根本就不存在主体的概念,所有人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都统用一个字母“L”表示,把人简单异化为同质的生产要素,差异化的主体被抽象化为同质化的劳动力,这是对现实最大的扭曲。缺乏主体性导致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远离了社会科学,把个体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排斥到了经济学视野之外,也使其背离了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分工与合作的基本原理,成为一个静态、均衡的经济学,正如弗兰克·马科维奇(Frank Machovec)所言,经过20世纪头40年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从一个“过程的理论”转变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均衡理论”。^①主流经济学背离了主体的概念,也使其理论体系中忽视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作用,忽视了“价值创造”。^②“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屡屡失灵,是因为它背离了信息论一条关键原则。‘价值创造’本是一条比较高级、比较复杂的活动,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却居于低级和次要的地位,相反,‘价值衡量与交换’本是比较低级的活动,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却超越了‘价值创造’的地位。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断提升工具性的交换机制的地位,最终使其占据了整个经济学体系,而生产全新商品的自由企业家们开展的不可预期的活动导致的熵与惊异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视。”^③对企业家们的忽视是主流经济学最大的缺陷。企业家在动态的市场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理性人”的假设,使得传统主流经济学缺少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洞察力,变成了一个静态均衡的理论,这与现实的动态非均衡的特点是不相符合的,与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和价值的实现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批判和反思主流经济学理论,必须从其“理性人”假设这个逻辑起点开始,必须回归真实的“行动人”假设,以此来重新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借此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的探索。

二、“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下人文经济学内涵思考

米塞斯提出了人的行动科学,其基石是行动着的人。行动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可以精确地用数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学规律“运动”的石头或原子;相反,人有其努力实现的内意图、目标或目的,人也会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想法。简而言之,与实证主义者相反,米塞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识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具备心智,正是这种心智让他决定目标,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行动之存在,除了通过观察行动着的人之外,也可以通过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发现。^④米塞斯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和主观主义价值论传统,建立起以人的行动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将经济学转变成以真实“行动人”为主的社会科学。奥地利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哈耶克提出了社会经济自发秩序理论,反对建构的理性。^⑤自发秩序是他对斯密的市场秩序更具体化的阐释。哈耶克曾说:“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人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形诸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期间的社会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化出来的,从而也是世代经验的产物。”^⑥哈耶克认为人是“无知”的,但他并不否定“理性”,而是认为人是“理性不及”。理性不及不同于“非理性”。他强调人的理性是在规则中习得的。他在《自由秩序》一书中提出,确保自发秩序得以产生的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与竞争。其中一般性规则居于中心地位。^⑦因此,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从规则中习得的,他的理论是一种“规则理性”。哈耶克的“规则理性”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⑧

① 伊斯雷尔·M.柯兹纳:《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朱海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②③ 乔治·F.吉尔特:《知识与权力》,蒋宗强译,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10页。

④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

⑤⑥ 朱海就:《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0-15页。

⑦⑧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的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朱海就教授综合了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理论和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理论,提出“行动—规则”的理论范式。^①他不仅是对两位奥派代表性人物理论的简单综合,而是看到二者理论的内在统一性和互补性,试图建立一种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理论范式,提出由行动和行动协调所生成的分工合作的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是文明的底层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如果说米塞斯的行动理论是一种微观经济的理论,那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就是一种宏观经济的理论。“行动—规则”视角对于认识真实的、鲜活的人的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理论范式缺少了空间的维度,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最大的缺失。我们无法离开空间维度去谈论人的行动;反之,也无法离开人的行动去讨论空间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苏贾提出了空间的本体论,以及社会、历史、空间三元辩证法等概念,充分肯定了空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②克鲁格曼等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空间维度,但其仍然是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去思考空间,仍然没有把空间置于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理论中。因此,为了更好地赋予经济学科学的内涵,并能够更好地揭示人文经济学的内涵和实践本质,笔者认为需要在“行动—规则”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行动—规则—空间”三维理论范式和视角。将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转变成为真实的“行动人”假设后,行动人的选择首先是一个空间区位的选择,以及个体行动及其协调必然是在具体空间维度中展开的。行动人的区位选择和行动空间一定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差异空间,这个差异空间一定是经济、制度和文化叠加的空间,或者是一个人文和经济叠加的社会空间,它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产物,空间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空间过程。作为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社会空间,它突破了牛顿的绝对空间。每个空间独特的文化生态生成于大量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一旦一种文化生态系统生成,就必然对这个空间中人的行动和行动协调产生深刻影响。每个空间一定有独特的文化生态,但作为人性一定有共同之处,作为市场空间一定有共通点,这个空间文化生态也必有共同的文化价值,是独特性和共同性的统一。要理解人文经济,就需要对个体行动及其协调所产生的分工与合作的自发秩序有深刻理解,这样的自发秩序也有利于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的生成,反之亦然。自发秩序与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都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产物,它们是叠加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一旦形成也会反作用于个体的选择和行动,以及个体行动之间的协调。

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方能深刻理解空间组织和空间过程的内涵。主流经济学提出“经济人”的假说,舍去了空间的差异性,扭曲了人的本质,把人设想为一个一切都安排好的机械的“理性人”。伴随对理性人的假设,自然也舍去了空间差异性和动态的空间过程,留下一个均质空间的概念。把空间看成一个均质的没有差异的牛顿的绝对空间,是与“理性人”的概念对应的。但与真实人的行动对应的是差异空间,这样的空间是一种关系空间或者社会空间。空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既包含一种自然性,也包含制度、规则、文化环境等叠加性,它是大量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长期演变的结果。因此,需要突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行动—规则—空间”的视角去揭示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和动态空间过程的本质内涵。空间过程就是分工与合作自发秩序的空间投影,空间不是容器,空间就是一种个体行动协调的动态过程,空间就是一种自发秩序和文化生态。因此,“行动—规则—空间”是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个体行动及行动的协调生成了空间秩序(经济自发秩序、文化生态系统),一旦空间秩序和文化生态形成又会反作用于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强调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于理解人文经济的内涵具有重大的意义。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认为,从“行动—规则—空间”思考人文经济学的内涵和实践,就必须重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即基本的假设,这个基本假设就是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行动人”而不是“理性人”。这就要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回到一个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回到有血有肉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真实的“行动人”身上。从真实的“行动人”去构建“鲜活的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失去了人的行动,

①朱海就:《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上海三联书店 2021 年版,第 1 页。

②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读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页。

人文经济学就失去了微观的基础,就缺少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动力。没有行动的主体人,人文经济学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哈耶克曾指出:“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来经济学的每一项重大的进步,都是向着不断采用主观主义的方向前进了一步。”^①“行动—规则—空间”既具有纵向的历史发展的解释力,个体的行动以及行动协调演化生成的分工合作的网络(自发的秩序、文化生态系统),这是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同时,又把空间过程以及不同差异空间之间相互作用纳入理论体系之中,具有鲜明的空间性。人文经济学必须尊重个体行动以及行动的协调(一般性的规则);没有一般性规则(比如法治的营商环境、价格、私有产权等)就没有人的自由行动和自由选择权,人文经济的发展就缺少了底层逻辑。一个地方的人文资源,它是大量微观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产物,离开了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一般性规则),就难以解释历史人文资源的生成。在此笔者更喜欢用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代替静态的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文化生态系统更似一种不断演变的有机体,它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人的行动和行动协调生成了自发的经济秩序和基于自发秩序的文化生态系统,宏观的自发秩序和文化生态又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性互动;同时,自发秩序和文化生态又会反作用于人的行动。人生活在一种自发秩序和社会文化生态的结构之中,社会文化生态结构会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教授数十年致力于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在《大繁荣》中,他将文化氛围或创新文化生态体系置于一个创新经济体系的核心,这在经济学传统里非常少见。“迷恋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往往认为文化‘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实证,难以成为任何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变量。然而任何深入研究硅谷和其他创新活力中心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文化生态系统才是创新活力之源。”^②反过来,个体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也在不断地重塑着社会文化生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上述关于个体行动和文化生态的思考显而易见都具有空间维度。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理论范式去思考,可以突破传统经济学缺乏空间维度这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经济学的理论,即这里的空间绝非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牛顿的绝对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关系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空间。空间过程赋予了经济学的演化思想,人文经济是经济形态演化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苏杭这些地方文化很发达,经济照样发达,其实已经暗含着人文经济的空间维度,以及文化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文化生态和个体行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赋予了一种经济和文化生态双螺旋相互促进的动态演化思想。所以人文经济从空间维度上讲,它的文化生态系统生成于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一旦生成它就成为一个磁场,影响着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金碚教授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域观经济学。他说:“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以经济理性为支柱,而域观范式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制度形态三维为支柱。”^③微观宏观经济学以追求“均衡”的最优为逻辑指向,而域观经济学则以刻画多元域态和发现域际机理为逻辑指向。微观宏观逻辑有一维倾向,而域观经济学逻辑有“三维”特征。^④其实也是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但金碚教授域观经济学里面缺少了主体行动者的概念,缺少行动协调的概念,也缺少了行动协调产生的自发秩序的概念,即缺少了空间的动态过程。“行动人”应该成为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一定要回到真实的行动人这个起点。科斯曾说:“通常,人们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抽象的‘经济人’,他只是单纯地追求自身利益。但是,斯密不可能认为将人看做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是合理的。他认为,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别人;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人仅仅是透过自我欺骗的面纱来感知自己活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愿意有保留地接受斯密有关人性即使不全是真理至少也有大部分正确的观点,意识到

①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②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大繁荣》,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③④ 金碚:《新盛时代,本真复兴——金碚新论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第328-329页。

他的思想比通常认为的有更宽宏的基础,这会使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观点更加强大,结论也更有说服力。”^① 科斯的这段话表达了斯密对人性的假说也不仅仅是理性人,其实人是真实的行动人,真实的个体行动一定是在一种经济文化和制度叠加的空间中,不仅受经济理性的影响,也受到文化价值和制度的影响。

“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以及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通过行动打通了微观和宏观(空间)之间逻辑上的断裂点,行动和行动的协调形成微观和宏观之间连接的逻辑之桥。人的行动是微观的概念,但通过行动的协调(一般性规则)则生成一种自发秩序即中观和宏观秩序,而空间则是自发秩序的投影,空间也会反作用于人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人文经济作为“行动—规则—空间”的演化产物,对于人文经济学的认识可以从微观的行动、宏观的秩序,以及连接二者的一般性规则去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演化的层面去思考,人文经济的实践并非通过设计而建构出来的,它一定是个体的行动及行动协调演化的结果,即人文经济一定内含于行动和行动协调,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生态空间中。离开了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以及由此所生成的社会文化空间磁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人文经济的内涵。因此,人文经济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必须赋予其动态演化的特征,必须赋予其主体的内涵,必须赋予其一般规则的内涵,同时要赋予其自发秩序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内涵。

从行动者主体的概念思考经济学的发展和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将人的创造性概念纳入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的体系之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新经济学》中提出:“人心的创造性和创造力是人的一切行为之本质的根源。理解和揭示人的一切行为,首先必须深刻认识人的创造性本质。”^② 从人的行动和人心无限的创造性这样先验的假设出发,可以将企业家理论融入整体的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使其更接地气,更有解释力。我们无法否认伟大的企业家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熊彼特以及奥派的柯兹纳已经深入地研究了企业家的理论。如果深入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企业家的重大作用。比如南通张謇通过“实业救国”,建立“近代中国第一城”;再比如无锡的荣氏家族,通过经营企业对于无锡乃至中国工商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要看到现代的任正非、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等这些国内外伟大企业家对于整体经济秩序即分工合作秩序建设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对于基于空间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生成和演变起到重大的作用。这些企业家生活在基于工商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耳濡目染地受到区域商业文化的熏陶,同时他们也在为这种文化生态的发展演变做出巨大贡献。这些伟大企业家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年代,都抓住了时代发展的重大机遇,都体现了一个具有创造性主体所具有的作用。总之,在强调微观主体行动者在塑造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作用时,也要强调宏观的文化生态磁场对于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的作用。还必须强调基于市场的一般性规则的基础性作用,比如价格、私有产权、法治营商环境等,这些是个体自由选择和创造力发挥的基础,是人文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一个地方法治营商环境越健全,这个地方整体的效率就越高,整体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人文经济发展也就越好。

自发秩序和文化生态系统处于动态的历史演进中,比如苏杭历史上市场经济就很发达,其具有源远流长的工商文明的基因。在这样的区域中,个体更有活力和创造力,文化生态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个体行动及行动协调的分工与合作网络更加发达,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与分工合作的自发秩序相互作用就会不断地强化。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人文经济学之问,就是洞察了这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我们必须科学地回答和研究总书记人文经济学之问。人文经济作为经济形态的演化产物,其必然符合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人文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人文化和人文的经济化,这些只是表面呈现的结果,其深层逻辑是个体行动及行动的协调,以及由此形成的自发秩序与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化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等。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视角可以深度揭示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及人文经济学的实践走向。这里以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调研过的苏州为例,分析苏州人文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

①转引自金碚:《新盛时代,本真复兴——金碚新论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第328-329页。

②向松祚:《新经济学》(卷三),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3页。这是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的超越。

苏州文化植根于吴地区域文化(简称“吴文化”),吴文化以先秦吴国文化为基础,经过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变。植根于吴文化的苏州文化使其较其他地方文化有更强的开放性,更易于吸收和融汇外部优秀文化。这种开放性、融汇性等文化生态系统和基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苏州实践以强大的内生动力,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把控未来变化趋势,整合社会资源,探索新发展道路,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①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积淀深厚的文化生态系统来源于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来源于大量个体的创造力。

从世界范围看,很多农业文明都起源于大江大河的冲积平原,尤其是江河入海的三角洲地带。苏州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借助地利,苏州较早形成了发达的农业,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意义上的“镇”和“城”,这些镇和城不是基于军事和政治的目的而形成的,而是完全出于商品交换流通的需要而形成的,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集聚区。因“市”成“城”,是这个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强大推动力。在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演进过程中,也形成了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主体,并形成了独特的带有工商业文明基因的区域文化生态,以及形成了尊重市场规律的一般性规则。王宁教授将苏南区域文化特点总结如下:“一是区域共识性。主要是指苏式生活的全域态和多层次性质,它是基于经济发展在江南尤其是苏州形成的阶段性全民性共识。二是“向心”的反观和内省。即注重内心感受,注重超越物质层面的个体性和精神性。三是“后农业”特质。是指苏式生活其实是小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完成阶段性跨越,即从小农向手工业、从工业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的产物。四是尊重个体自由。是指它尊重个体自由和生命价值。”^②以上四个特点尤其是对个体自由和创造力的尊重,是苏州现代化实践特质中最具活力的因子,而这些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个体又通过一般规则形成一种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生态,即发展共同体。这种发展共同体既不同于西方原子式的发展模式,又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活力的所谓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共同体,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共同体,是一个实现个体与群体价值统一的共同体。从苏州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这种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代就形成了基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的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同时形成了具有活力的各类市场主体。这种包涵工商业基因的文化生态对于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开放性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从“理性人”的经济学到“行动人”的经济学,这是一个经济发展不断演化的必然过程,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于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在于人从对物质的需求到精神的需求转换。马歇尔所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应着牛顿时期的经济学,这个时期更多地表现为人对物质的追求,一切目标都是增加物质财富,物质碾压了人的主体性。当发展进入物质极其丰富的阶段,人的追求就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物质财富,主观人的感受,人对精神的追求,包括人对美好生活和良好的自然环境的追求等就更加重要,这个时候对物质追求的“理性人”就远远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了。人的需求的拓展要求重新思考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理性人”假设与“行动人”假设其实也是不矛盾的,人的行动受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这些因素的权重是不同的,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理性人”更合乎现实,但越过了这个阶段,经济理性权重自然会降低,文化精神等层面权重则会增大。所以,“行动人”假设可以统一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未来经济学的演变,也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人文经济的内涵;人文经济必须纳入经济体系的演变中去思考,它是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从“行动—规则—空间”三维角度思考人文经济学,要求我们必须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基本原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条原理就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所形成的分工合作的原理,这是文明的基石,也更应成为人文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对分工合作的基本原理的尊重,必然要求对基本法治规则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尊重。

①段进军:《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的历史演变与实践特质》,《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20-25页。

②引自苏州大学王宁教授2022年12月6日在中国戏曲学院的讲座“慢说昆剧”的发言稿。

三、人文经济学视角下高质量发展思考

第一,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高质量发展要回到“行动人”这个逻辑起点。人文经济学如果只是着眼于对过去历史文化简单总结,不能着眼于未来,不能发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那就大大降低了人文经济学概念提出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高质量发展必须回到“行动人”假设,回到对一般性规则的尊重,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家在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微观行动者特别是企业家的创造力,就难以取得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满足人的需求以及充分调动人的创造性,高质量发展更应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其根本就在于改革开放;把开放和放开结合起来,激励机制做对了,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对于个体自由选择和行动,以及对一般规则的尊重,这对于人文经济学推动下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也是适用的。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环境、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出主体的活力,这是必由之路。体制机制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和道德规范。这种法治环境和道德规范,叠加历史演变所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未来人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从物质经济到人文经济,这种转型是市场经济演化的必然规律。人文经济既然内涵于市场经济内部,我们就应该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伴随着“物质经济”到“人文经济”的转变,市场会出现更加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态,我们很难去设计其复杂多元的路径。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所有技术的进步都伴随着从单一的物质经济走向一个基于人的精神需求的人文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人文经济的伟大目标,需要伟大的企业家创造性地将这些技术转变成为一个更加人文化的产业和产品。从产业和产品具象的角度来讲,人文经济就是将技术和人文的要素融合起来。这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企业家的创造力在人文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当然并非贬低一些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的作用,而着重是强调人文经济除了抽象的理念以外,必须将人文经济理念变成一种产业和产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文经济既体现在抽象的宏观经济秩序和人文生态系统方面,也体现在微观行动者的观念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和产品层面的创新上。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讲到,美国从1965年到1985年这二十年里出现繁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研究结果发现是美国用创新型经济取代了过去的管制型经济,所以美国出现了繁荣,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就业人数从7 000万人提升到了1.1亿人。^①在此他强调了企业家在创新型经济中的作用。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是推动人文经济实践的重要动力;离开市场经济去空洞地谈论人文经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既然需要从市场经济去思考人文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必须从演化的角度去发现经济演变的内在规律。

进入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简单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仅仅靠大众化的物质需求已经难以拉动消费,那么就必须回到一种“精神经济”——物质作为一种载体,精神则是其内容。消费者主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消费者需求发生了变化,将倒逼着产业发生变化,企业家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取利润。“消费者主权”逻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变化,它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演化的始终,对于人文经济也是适用的。人文经济发展是否成功,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由消费者说了算,所以要尊重“消费者主权”的逻辑。当物质需求转型为一种精神需求,“物质经济”就必然转型为一种“精神经济”。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化和产品化,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技术的发展就失去了其意义和价

^① 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蔡文燕译,机械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值,人文经济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高质量发展要反思国内这些年粗放的增长模式所导致的空间问题。空间战略始终是政府制定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成功的空间战略会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错误的空间战略则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就涉及空间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从“行动—规则—空间”的三维视角看,空间其实就是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所形成的分工合作和文化生态的投影。空间不是容器,空间应该是人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的产物,空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形成知识的分工和知识的创新。空间也是制度、规则和文化叠加的文化生态系统。城市是每一个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同时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系统,反作用于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空间失控”^①、空间蔓延等其实是政府错认为可以设计一个空间,但如果没有产业支撑,没有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所形成的分工合作和文化生态的支撑,空间就成为一个没有内容的容器,构不成社会空间。太多的空间战略失败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一点。最近诸多房地产企业的爆雷就预示着发展必须转型。

城镇化要回到“以人为本”,回到“行动人”的假设,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农民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应该和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城市权利。很多大城市以“城市病”排斥大量外地人进入,这就是剥夺个体的空间选择权利。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则和人的基本权利。城镇化空间必须实现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尊重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同时,要把更多的人文因素或者文化生态系统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注重城市社会问题,比如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总之,要对市场主体更加尊重,对一般性规则更加尊重。城镇化第一个发展阶段,主要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支撑下的粗放式发展,可以称之为“以物为本”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创造力和人的自由在发展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必须转变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发展新阶段,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和人的创造力,这是人文经济发展的要求。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人的实质自由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构成了发展的目的^②,这与人文经济学的理念是统一的。基于这样的思考,人文经济学的本质是应该体现一种新的制度建设。城镇化应转型到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的建设;没有这些底层逻辑的建立,人文经济的大厦就不能夯实,人的自由就难以得到保障,人的创造力就难以激发,高质量的发展就难以实现。

第三,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高质量发展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辉煌成就得益于全球化红利,有人认为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进入“逆全球化”时代。笔者不认可“逆全球化”这个概念,或者说“逆全球化”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全球化仍是大趋势,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变化。当前全球化步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新问题、新趋势。之前的全球化是我们被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的客场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应转变为基于行动者(企业家)创新推动的主场全球化。全球化是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每一次全球化都是以科技作为重要动力推动的,这是全球化的深层逻辑。如果把人文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预示着进入新阶段全球化可能不再是“中国制造”,而可能是“中国创造”“中国智造”“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智造”“中国品牌”,将会融入更多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成为主动推动全球化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同上述对城镇化的思考相类似,对中国来讲,“以物为本”的全球化时代结束了,要切换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的新阶段,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新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深挖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又要在与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去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文化,归根结底要释放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行动—规则—空间”的视角,从更加开放的视角去思考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人文经济学虽然立足于某一特定空间,但人文经济学

①陆大道等:《2006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扩张》,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8 页。

②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7 页。

所揭示的內涵則具有重要的普遍價值。從上文中我們提到差異空間以及空間的相互作用的原理可知,中國只有融入世界,在與不同區域的分工與合作中形成競爭優勢,才能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個體行動及行動協調必須遵守一般性的規則,這種共同的價值和規則是人類文明所共有的。換句話說,人文經濟學必然是與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脱离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符合人文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綜上所述,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地提出發展人文經濟,這既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符合時代發展的大趨勢。我們需要從“行動—規則—空間”三維視角,深刻揭示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和內在規律,更好地推動人文經濟學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最終實現現代化。同時,發展人文經濟要有世界眼光,中國發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發展更离不开中國,發展人文經濟要為世界發展貢獻智慧。

[責任編輯:趙 強]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Rule-Space”

DUAN Jin-jun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stitut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ie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today they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because their basic assumption of “rational man” makes their theoretical system increasingly lack the concept of human being. We need to transform the “rational man” hypothesis into the “action man” hypothesis, from the “action-rule-space”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o think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economics and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rational man” to a real “action man” has given the subject concept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because without a real action man, it is difficul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ecome a dynamic theoretical system. Second, action people have their own goals and means, a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own goals,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action people, and this coordination must be done through general rules, which arise from the long-term game among a large number of micro individuals, which giv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ule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logic and practical deduction of individual actions and action coordination. Without a spatial dimension,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d becomes an abstract concept. In short, thin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from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action-rule-space” can reveal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and promote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ction; rule; space; humanistic economic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